

台北清真寺與冷戰時期 國際宣傳

● 平山光將

歷史學者白壽彝曾經指出，自伊斯蘭教(回教)在唐代傳入中國以降，伊斯蘭教徒便以禮拜寺(清真寺)作為宗教活動的中心^①。清真寺除了作為禮拜場所之外，也有穆斯林之間相互交誼，參與伊斯蘭教育，學習阿拉伯語、波斯語等教學和語言功能，並具有政治性功能。日本伊斯蘭教史專家羽田正曾探討清真寺建築的功能，以及其與政治權力的歷史脈絡。他指出，大型清真寺象徵着其奠定者權力的正統性，歷代伊斯蘭王朝透過清真寺給海內外穆斯林展示其統治合法性，並具有強化宗教虔誠的作用；隨着伊斯蘭教勢力不斷擴張，其受到各地文化洗禮，建築模式也各有特色^②。羽田正所探討的清真寺歷史局限於十七世紀之前，此後清真寺的政治性功能不斷增強；隨着民族國家體制與近代外交模式的形塑，各國政府側重意識形態宣傳，宗教也成為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筆者於2013至2016年在台灣進行學術研究時，經常訪問台北清真寺。台北清真寺是一座具伊斯蘭風格的建築，供穆斯林禮拜的大殿上方有一座大圓頂與兩座小圓頂，清真寺後面也有兩座小圓塔，大殿前有小庭院。筆者在每個星期五的集體禮拜以及古爾邦節等伊斯蘭教重要節日，都會拜訪來自海內外的穆斯林，了解台灣伊斯蘭教的狀況。另外，筆者還專門拜訪台北清真寺，與原總幹事馬希哲討論台灣伊斯蘭教史，他給筆者展示了台灣伊斯蘭教相關的老照片，也講述了他們的老故事。由於研究同行的建議，加上訪談工作有所進展，筆者逐漸開始關注台北清真寺的歷史脈絡，收集相關的材料，發現台北清真寺在冷戰時期扮演了國際宣傳的角色。

各國清真寺在二十世紀仍扮演為本國政界或宗教界向國際宣傳的角色，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伊斯蘭教界透過東京清真寺的建設宣傳日

* 筆者如沒得到研究同行的協助，就無法完成本文的撰寫，尤其是原台北清真寺總幹事馬希哲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訪問，討論的收穫甚多；島田大輔博士也建議筆者撰寫台北清真寺史的文章，他的建議奠定了本文的敘述方向；包修平博士、匿名審查人與編輯的審查意見也令筆者獲益良多。在此向各位先學一併致謝。

本的伊斯蘭教政策，向伊斯蘭教國家表達善意^③。本文之所以關注冷戰時期台北清真寺的國際宣傳，是因為台灣伊斯蘭教界也有類似的現象，穆斯林透過台北清真寺的擴建，試圖將台灣的宗教狀況展示給國際伊斯蘭教界，並進行政治、外交等議題的立場宣示。

筆者與研究同行已闡明冷戰時期台灣穆斯林及相關團體的發展歷史^④，此外，雖然學者已基本釐清台北清真寺的歷史脈絡與現代適應等議題^⑤，但還沒探討過台北清真寺與冷戰時期國際宣傳的議題。本文從「泛伊斯蘭主義」與冷戰國際格局的角度，探討冷戰時期台北清真寺的發展。

一 泛伊斯蘭主義與冷戰

十九世紀以後，中東穆斯林知識份子如里達 (Rashid Rida)、阿富汗尼 (Jamal al-Din al-Afghani) 都提倡泛伊斯蘭主義，以應對歐洲勢力在伊斯蘭地

區的深入發展。他們強調所有穆斯林不分國籍、種族，需凝聚團結，形成烏瑪 (Ummah，穆斯林在精神上的民族共同體或社群)。奧斯曼帝國崩潰後，哈里發 (Caliphate，伊斯蘭教在宗教及世俗上的最高統治者) 的神聖地位被廢止，烏瑪遂成為團結穆斯林的核心概念^⑥。

由於交通運輸發達，泛伊斯蘭主義通過到麥加朝覲以及到埃及、土耳其等國家留學的穆斯林傳入中國。清末民初以後，北平成達師範學校、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等伊斯蘭教學校分別出版《月華》、《伊斯蘭學生雜誌》等期刊，宣傳泛伊斯蘭主義。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回教救國協會 (日本投降後改稱「中國回教協會」) 也積極提倡泛伊斯蘭主義，加強國際宗教交流等^⑦。

1949年以後，部分穆斯林跟隨國民政府到台灣，但大部分伊斯蘭教教務經驗豐富的穆斯林都滯留在中國大陸^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伊斯蘭教界逐步深入發展，試圖



台北清真寺春節第一天禮拜。(圖片授權：台北清真寺 Facebook 專頁)

爭取國際穆斯林的認同。1953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協助中國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展開文化活動與海外活動。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阿拉伯語人才與宗教人士的培養：1955年，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在北京成立，由達浦生、馬松亭等中國伊斯蘭教界著名阿訇（Akhund，伊斯蘭教內學者）擔任教務，進行阿拉伯語教學與伊斯蘭教教義的研究，培養阿訇人才，也試圖廣收國外穆斯林留學生。中國穆斯林學者馬堅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開辦阿拉伯語課程，大量培養阿拉伯語人才，以便中國對中東國家展開外交活動。他積極參與中國的海外宣傳活動，如將毛澤東的革命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翻譯成阿拉伯語，又擔任毛澤東的阿拉伯語翻譯^⑧。1956年，印尼舉辦萬隆會議，中國、埃及、印度等國家以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政治理念加強團結；中國與埃及等中東國家建立邦交之後，與埃及政府締結中埃兩國文化合作協定，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邀請兩位埃及專家來華講授阿拉伯語與阿拉伯文學課程，政府也派遣馬堅等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核心人物訪問埃及^⑨。

國民政府遷台後，一直宣稱其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並得到美國政府的援助，因而加大文化、宗教宣傳的力度，如與美國共同製作宣傳片、打造廣播事業等。與此同時，雖然遷台的穆斯林重建了中國回教協會，但相較中國大陸伊斯蘭教，台灣穆斯林的發展資源極為有限。他們既深感共產主義在伊斯蘭世界取得優勢，也認為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的無

神論水火不容，尤其是中國大陸與蘇聯對烏瑪構成威脅，因此提倡以泛伊斯蘭主義對抗共產主義，「拯救」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穆斯林^⑩。國際宣傳成為中國回教協會對抗共產主義的手段之一。

關於台灣伊斯蘭教界的國際宣傳，筆者初步調查了相關政府檔案，發現中國回教協會與中國廣播公司共同製作阿拉伯語節目，展開反共宣傳；該會的定期刊物《中國回教協會會報》得到台灣當局的資助^⑪。除此之外，該會也將台北清真寺當作國際宣傳的平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用以接待訪台穆斯林領袖；第二，為台灣穆斯林提供禮拜場所；第三，向海內外穆斯林展示「自由中國」的宗教政策。

1947年，台北清真寺初設於台北市麗水街，由日式建築改造而成，但該寺的設備極為簡陋，不便海內外穆斯林貴賓參訪，因此中國回教協會向行政院提議擴建台北清真寺，並指出中國大陸已與埃及、敘利亞建立邦交，共產主義集團逐步深入中東地區，台灣當局需要得到伊斯蘭教國家支持，以確保聯合國內的「中國」代表權^⑫。1957年，中國回教協會設立台北清真寺擴建委員會，由白崇禧、孫繩武等協會核心會員以及葉公超、谷正綱等政府官員組成^⑬。前新疆省政府主席堯樂博士是提倡台北清真寺擴建的政府官員之一，他的建議如下^⑭：

政府遷台以來，同胞追隨來台者為數甚多，雖亦有清真寺之設，但以借用民房規模狹，平時教胞禮拜已感

不便。每遇回教國家之使節及僑民詢及台北清真寺，或要求參拜者，深恐簡陋不堪。

擬請由政府斥資建築清真寺，其規模相當於台北市貴陽街實踐堂，而保持清真寺之回教風格，以壯國際觀瞻，而利回民禮拜，並示政府有待回教之得意。

從國際宣傳與接待外賓的角度而言，台北清真寺擴建實屬當務之急，迫在眉睫。

二 台北清真寺落成典禮與國際宣傳

1958年11月，台北清真寺擴建工程正式啟動。在擴建期間，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內政部、中國回教協會等組成的宗教聯繫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輔導小組」）將台北清真寺落成典禮提上日程，並提議邀請海外嘉賓參加落成典禮，以配合台灣的外交政策、增進與伊斯蘭教國家的友誼^⑮。他們欲邀請的國家與宗教領袖偏重在東南亞地區，其原因與中國大陸的統戰外交深入到東南亞地區有關。1950年代，共和國政府的統戰外交在新馬華人社區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透過報刊、廣播等傳媒，籠絡工會等左派社團^⑯。

1959年12月，輔導小組正式邀請外賓，主要包括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穆斯林政治與宗教領袖，如馬來亞聯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菲律賓、泰國、蘇門答臘、

汶萊、巴基斯坦的政治、宗教領袖，日本國際回教協會理事佐久間貞次郎等^⑰。

輔導小組在邀請外賓名單上考量了一系列問題。例如，泰國不是伊斯蘭教國家，若將泰國伊斯蘭教大教長列入招待外賓名單，勢必會造成泰國政府的疑慮、誤解，直接影響今後台泰關係的發展，因此沒作出邀請^⑱。由此可見，邀請穆斯林外賓的名單因應當地政治情況與族群關係而有所調整。

台灣當局高度重視馬來亞聯邦，希望透過宗教合作加深兩地聯繫，以抵制馬來亞共產黨的發展；革命實踐研究院也認為，馬來亞與新加坡不少居民都信奉伊斯蘭教，必須邀請馬來亞代表參加落成典禮^⑲。不過，東姑阿都拉曼因為要訪問英國參加總理會議，未能出席落成典禮。因此，輔導小組邀請馬來亞聯邦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拉薩克（Abdul Razak Hussein）為馬來亞代表^⑳。

1960年3月3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辦台北清真寺落成典禮接待外賓專案小組會議，決定落成典禮的日期按照拉薩克來台時間而安排；預定時間是4月12日（後來延後一天），主賓是拉薩克與汶萊蘇丹奧瑪阿里賽義夫汀三世（Omar Ali Saifuddien III）。但由於4月1日馬來亞聯邦最高元首端姑阿都拉曼（Tuanku Abdul Rahman）逝世，因此拉薩克臨時無法出席落成典禮^㉑。輔導小組印發照片、出版兩萬本阿拉伯語小冊子、製作阿拉伯語配音的華語電影等，在典禮上派發、播放，向海內外穆斯林宣示台

灣的伊斯蘭教政策和華語文化。此外，也邀請了美國俄亥俄州《春田報》(Springfield News-Sun) 共和黨籍記者貝克(Margaret Baker) 與美國合眾國際社(UPI) 駐台北記者陸正(Ghanles G. Lone) 等人進行採訪²³。落成典禮充滿官方色彩，儀式極為隆重，大約有六百多人參加典禮，參加者包括陳誠、張群、王雲五、蔣經國、于右任、羅家倫等政府官員，各國駐華大使，以及白崇禧、時子周等中國回教協會核心人物²⁴。

落成典禮開始之際，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時子周發表談話，譴責中國大陸的民族政策與宗教政策，批評共和國政府在展開反右鬥爭時破壞清真寺；在推動人民公社運動中將清真寺改造為倉庫、工廠、公共食堂等，並強調相較對岸穆斯林的處境，台灣穆斯林能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²⁵。落成典禮完結之後，各國穆斯林代表團會見副總統陳誠、立法院院長張道藩、外交部部長黃少谷、內政部部长田炯錦等。4月14日，他們參觀桃園石門水庫，搭乘民航公司班機飛往台南，到高雄參觀台灣鋁廠、觀賞軍事節目等。16日，他們返回台北，結束行程²⁶。

如前所述，中國回教協會以泛伊斯蘭主義運動推動穆斯林團結、發展伊斯蘭教事業。在落成典禮上，該協會(代表台灣當局)與汶萊、菲律賓、日本等三國穆斯林代表商討了泛伊斯蘭主義的議題，以應對共產主義集團提倡的無神論及其外交勢力的增強，並發表〈中〔中華民國〕、汶、菲、日四國回教代表協議備忘錄〉，力圖建立永久性反共機構，並試圖申請加

入由台灣當局主導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²⁷。但據筆者所知，該機構至今還沒有正式成立。

三 海外穆斯林領袖訪問 台北清真寺

冷戰期間台北清真寺國際宣傳的實效因史料的限制而難以評估，本文從有限的史料討論各國穆斯林代表團訪問台北清真寺的情形，以及他們在訪問台北清真寺時的感受。

在台北清真寺擴建前後，各國政治領袖、宗教領袖與穆斯林代表紛紛到訪台北清真寺、訪問中國回教協會的核心人物、參加每個星期五的集體禮拜等，他們也透過台北清真寺了解台灣的宗教政策與伊斯蘭教在當地的情況。例如，1956年10月，土耳其安哥拉市長艾倫(Orhan Eren) 訪問台灣時參觀台北清真寺，強調台灣與土耳其之間的友誼，歌頌土耳其革命事業等²⁸。1959年2月，約旦國王胡笙(Husayn bin Talāl) 訪問台灣，考察經濟建設與土地改革，也訪問了台北清真寺；在此之前，台北清真寺趕建圓頂，清理場地。另外，胡笙捐贈給台北清真寺2,000美元與阿拉伯語《古蘭經》兩百部，與穆斯林為反共事業祈禱²⁹。

由沙特阿拉伯主導的世界回教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 成立於1962年，提倡泛伊斯蘭主義與反共主義，其領袖陸續訪問台北清真寺。台灣當局為了與沙特阿拉伯加強外交關係，讓中國回教協會加入該聯盟，孫繩武被選為該聯盟理事。1962年



台北清真寺在開齋節的盛況。(圖片授權：台北清真寺 Facebook 專頁)

10月，台灣當局邀請該聯盟第一任秘書長蘇祿爾(Muhammad Suruur Sabban)到台灣考察土地改革並訪問台北清真寺，會見中國回教協會核心人物和台灣伊斯蘭教領袖，他高度評價台北清真寺的發展：「中國回教協會在中國〔中華民國〕政府之扶植下，極成功的設立回教學校興建巨大禮拜寺以鞏固其基礎。在台北修建之大禮拜寺可與世界各大清真寺媲美，該寺附設孤兒殘疾及老人室，並有洗者之水房以及其他為該龐大社團需要之便利。」^⑳

從反共主義的角度而言，台灣當局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極為緊密。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國際空間大幅縮小。為了進一步密切與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關係，台灣當局邀請沙特阿拉伯國王費瑟(Faysal)訪問台灣，到訪台北清真寺與中國回教協會。費瑟具有強烈的反共思想，並試圖宣傳泛伊斯蘭主義，領導伊斯蘭世界^㉑。雙方在宗教方面的人員往來於1970、80年代絡繹不絕，沙特

阿拉伯使節、官員和民間代表均積極參與台北清真寺的活動^㉒。

1980年1月，世界回教聯盟第三任秘書長哈爾康(Shaikh Muhammad Harkan)到訪台北清真寺與中國回教協會，參觀台北清真寺大殿，也參加了每個星期五的集體禮拜。禮拜結束之後，中國回教協會舉行盛大歡迎茶會，盛況空前。哈爾康也將巨型《古蘭經》與世界回教聯盟旗幟分別贈送給台北清真寺和中國回教協會^㉓。

部分海外穆斯林領袖高度評價台北清真寺：台北清真寺設備周全，為穆斯林提供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場所，其規模不遜於全世界其他大型清真寺。台北清真寺的國際宣傳也取得一定的成果，大大提高中國回教協會的國際地位。然而，其有限成功難以打破台灣當局在外交方面的困局：中華民國失去了聯合國成員的地位，沙特阿拉伯等標榜反共主義的國家後來也陸續與中國大陸建立邦交。雖然如此，沙特阿拉伯等部分中東國家仍與台灣維持非正式外交關係，雙方的穆斯林互相往來。

四 結語

冷戰時期中國回教協會的核心思想是泛伊斯蘭主義與反共主義，因此積極展開國際宣傳，台北清真寺是其國際宣傳活動的基地之一。隨着中國政府對伊斯蘭教界的深入發展，中國回教協會與台灣當局透過台北清真寺落成典禮，加大國際宣傳力度，防堵共產主義集團面向東南亞地區的滲透，並在落成典禮舉辦之際與東亞、

東南亞伊斯蘭教界締結反共協議。邀請外賓到台北清真寺參觀也是國際宣傳的一部分，部分穆斯林政治領袖高度評價台北清真寺的發展。

隨着冷戰的終結，台北清真寺停止反共宣傳，隨即面臨拆遷的危機。台北清真寺的土地使用權自擴建以來一直還未確定，開發商試圖收購並計劃拆遷該寺。其後，中國回教協會將台北清真寺的土地使用權問題列入政治議題，1999年，立法院與台北市政府最終決定將台北清真寺列入市級文化古蹟名單，因而得以保護^④。

本文聚焦於台北清真寺與國際宣傳，但未深入探討中國政府的宗教外交，尤其是清真寺與兩岸外交活動的議題。這些議題今後有待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註釋

① 白壽彝：〈中國回教小史〉，載《白壽彝文集》，第二卷，〈伊斯蘭史存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15-16。

② 羽田正：《モスクが語るイスラム史——建築と政治權力》（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頁229-35。

③ 坂本勉：〈東京モスク沿革誌〉，載《アジア遊學》（東京：勉誠出版，2001），頁124；島田大輔：《戰時下日本の回教政策 1938-1945——外務省と大日本回教協會を中心に》（個人出版，2015），頁50。

④ 平山光將：〈延續與斷裂——現代中國回民知識份子的國民外交〉，《民族學界》，第34期（2014年10月），頁105-32；〈台灣伊斯蘭團體的活動と政教關係（1949年—1979年）——中國回教協會、中國回教青年會を事例に〉，《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第41期（2017年

3月），頁211-32；〈台灣伊斯蘭教團體の機關誌とその思想——中國回教青年會機關誌『回教文化』を事例に〉，《中國研究月報》，第72卷第8號（2018年8月），頁1-13；Włodzimierz Cieciora, “Chinese Muslims in Transregional Spaces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Beyo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 no. 2 (2018): 135-55; Janice Hyeju Jeong, “Between Shanghai and Mecca: Diaspora and Diplomacy of Chinese Musli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D. diss. (Duke University, 2019), 390-402; Tommaso Previato, “Politiche e rappresentazioni dell’alterità etnica. Le minoranze Naxi e Bai fra acculturazione e marginalità strategica”, *Sinosfere*, no. 5 (April 2019): 57-59。

⑤ 徐立真：〈清真寺的修建、沿革與當代適應〉，載趙錫麟、張中復編：《主名的傳承與延續：回教在台灣發揚和展望》（台北：政大出版社，2019），頁191-240。

⑥ Cemil Aydin, *The Idea of the Muslim World: 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5-132.

⑦ 〈聯絡回教世界計劃大綱草案〉，《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報》，第1卷第2期（1938年2月），頁22。

⑧ 包修平、高磊：〈中國回教協會在台灣延續與拓張〉，載《主名的傳承與延續》，頁108。

⑨ 馬賢：〈萬般事業之興，須務培養人才之本——憶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的三起兩落〉（2013年8月22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網，www.chinainislam.net.cn/cms/news/60years/jlwc/201308/22-5545.html；李振中編著：《馬堅傳》（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7），頁165-79。

⑩ 李振中：《尼羅河畔的回憶：新中國第一批留埃學生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頁182-95。

⑪ 包修平、高磊：〈中國回教協會在台灣的延續與拓張〉，頁108；白崇禧：〈回協今後的任務 代發刊詞〉，《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第1期（1952年7月），第1版。

⑫ 外交部：〈對阿盟國家用阿語廣播〉（1951年1月8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以下簡稱「近史所」），105.21/0002；〈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申請補助〉（1956年6月29日），近史所，152.11/0048。本文所引用檔案均無具體頁碼。

⑬⑭ 〈堯樂博士函張群〉（1956年7月16日），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0045/150.3/0001/001。

⑮ 〈擴建台北清真寺開工〉，《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第61期（1958年10月），第1版。

⑯ 〈宗教聯繫輔導小組第十七次會議台北清真寺落成典禮接待外賓計劃〉（1959年12月18日），近史所，152.1/0001。

⑰ 魯虎：《新馬華人的中國觀之研究 1949-1965》（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4），頁71-80、85-86。

⑱ 〈宗教聯繫輔導小組第十七次會議台北清真寺落成典禮接待外賓計劃〉；島田大輔著，張弈玲譯：〈國際モスレム協會（國際穆斯林協會）與1950年代日本對伊斯蘭宣傳工作：戰前日本回教政策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載李福鐘等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第二輯（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頁437。

⑲ 〈籌捐台北清真寺落成典禮接待外賓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1960年3月31日），近史所，152.1/0001。

⑳ 〈革命實踐研究院電外交部〉（1959年10月16日），近史所，012.22/0029。

㉑㉒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〇六次會議紀錄〉（1960年4月6日），國史館，008-011002-00035-007。

㉓ 〈外交部呈中國回教協會 行政院新聞局〉（1960年3月21日），國史館，020-100800-0029。

㉔ 〈台北清真寺落成六百餘人參加盛典〉，《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第73期（1960年4月），第1版。

㉕ 〈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時子周為台北清真寺落成發表書面談話〉，《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第73期，第1版。

㉖ 外交部：〈參加台北市清真寺落成典禮各國回教代表訪問日程〉（1960年4月9日），國史館，020-100800-0029。

㉗ 〈亞盟電外交部亞西司〉（1960年7月18日），近史所，152.11/0007。

㉘ 〈安哥拉艾倫市長參觀台北清真寺〉，《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第48期（1956年10月），第1版。

㉙ 〈約旦國王胡笙訪華 將接見本會代表參觀台北清真寺〉，《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第56期（1959年2月），第1版。

㉚ 〈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電外交部、中國回教協會〉（1963年11月15日），近史所，112.22/0017。

㉛ Joseph A. Kechichian, *Faysal: Saudi Arabia's King for All Seasons*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8), 172-91.

㉜ 〈回教協會在台北清真寺舉行盛大會禮，慶祝回教一年一度的忠孝節〉（1976年12月1日），國史館，150-031500-0018-007；〈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朝覲部長阿布都瓦西拜會清真寺，並贈送布幔予清真寺代表〉（1979年4月8日），國史館，150-031800-0027-003；〈沙烏地阿拉伯青年拜訪清真寺〉（1980年8月26日），國史館，150-031900-0016-003。

㉝ 定中明：〈世界回盟秘書長哈爾康一行訪台記〉，《中國回教》，第174期（1980年3月），頁32。

㉞ 〈台北市市定古蹟台北清真寺揭幕典禮——中國回教協會馬理事長家珍致詞〉，《中國回教》，第261期（1999年10月），頁2。

平山光將 日本中央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日本宮崎大學職員。